



源於真蓮

李漢源

從足球看社會

日前政府宣布將放寬防疫政策，意味着本地體育賽事也將可以一如期舉行，再不需要邊舉辦、邊提心吊膽地想着因疫情而要改期的後備方案，有雨過天晴之感。今個星期筆者參與一個台山社團總會主辦的學界排球賽事，見到一班中學學生，興高采烈一早來到球場比賽，個個摩拳擦掌希望馬上落場一展身手，想必他們已因疫情被困多時，能夠重新出來活動，可以過以往正常學生生活，其興奮程度真的難以想像。

其實這幾年疫情對青少年的成長實在有不好的影響，因為我總覺得體育、運動、比賽等對青少年成長有正面幫助，尤其是隊際比賽，可訓練他們合群、互相幫助、相互扶持，大家一齊去打比賽，可以學到絕不單球技，而是一系列對人生有幫助的元素。參賽中有一隊的隊員均是不同國籍的，比賽中他們用多種語言交流互相提點，奮鬥心亦很強，雖然他們排球水平並不是最高，但也能憑着隊內團結打贏一場又一場，希望他們能帶着這股氣勢殺入決賽。香港電視觀眾可以於今個星期日，10月9日下午兩點半香港電台32欣賞這一班香港排球明日之星的直播學界賽事。

體育是需要傳承的，而要社會體育風氣熱烈，就要一代接一代的傳承下去，雖不一定要每人都參加比賽，但如建立了運動潮流就一定可以令社會風氣注重強身健體。例如當年香港

滑浪風帆奪得奧運金牌，參與風帆訓練的年輕人馬上多了很多；今屆奧運劍擊勇奪金牌，參與玩劍擊的同學也馬上多了很多，雖有人認為一窩蜂未必可以維持很久，但能令未來棟樑們對運動的興趣萌芽，又怎會不是好事呢？我們是前人，可以製造體育風氣，待青少年參與體育，引領他們走上一條正確健康之路。

有時前人做得不錯有成就，要傳承給下一代，卻未能達到預期效果，所謂「創業難，守業更難」，足球就是面對這問題，雖然參與足球活動的人很多，足球是一種好玩又好睇又好睇運動，以前能製造熱潮，但現在失去了風氣，每次路過小型足球場，總是見到年長人士在踢波，不像以前總是一大班青少年的地盤，足球應該不是長者玩意吧？筆者因工作關係曾在巴西、日本等街頭拍攝當地的足球生活，在球場總會拍到一群青少年踢波，相較之下香港青年足球人口真的很少，相反長者足球人口就較多，星期六、日在旺角麥花臣小型球場或灣仔修頓小型球場經常有比賽，分40、50、60、70歲組，有過半是過往踢甲組或香港隊球員球星，所以都吸引過千觀眾觀看，觀賞性十足。

「傳承」是由下一代自由發揮還是應該由上一代設好系統有計劃傳承下去呢？其實社會上有很多事情也靠着制度傳承，足球是一個反映社會的小環節，如每一個小環節都能處理得好，這個大環節就能成為美好社會。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不要讓名字成為絆腳石

華裔、亞裔或非裔等少數族裔，名字因為與英文26個字母發音相去太遠，在英語國家裏，尋找工作時總會遇到多少麻煩，尤其是名字冗長拗口的非裔。

華裔比較好一點，我們飄洋過海謀生的祖宗，為求僱主和自己方便，數不盡自動轉名的彼得/查理/威廉/大衛，順口易記，一百幾十年來，還算工作順利，除了個別種族歧視，還不至於有太大的問題，辦公室政治的歧視則是題外話。

名字過長拗口，在華文來說，用字過僻，相信求職或進行工作也可能有一定難度，就是受到障礙，當事人還不知道，比如資方從眾多求職者名單挑選用人時，負責查閱者叫不出也寫不出的名字，故意溜過也是常有的事；甚至僱主為了不想日後溝通麻煩，同一學歷、同一條件兩個應徵者，說不定也會剔去名字拗口那一個，名字簡單順口，先天富音樂性，至少已予人親切感；名字乾澀拗口，就是出入境也會經常帶來不便吧，人際間交往，也可能像放置在自己大門前的無形頑石，有點拒人於千里。

取名選用僻字不是為貪一時好玩，也無非旨在強調性格與人不同，今日很多香港新一代事業型女性，為了表示自食其力，不再像她們母親那一代經濟需要依附異性生活，名字多已撇除用到什麼女性美的珍蘭芬芳，更視什麼真賢淑德為封建囚籠，甚至也不屑於在乎什麼勝男超男做男，主要為了表示「我係我」，只在字典裏挑不見有人用過的僻字，這現象比起來，內地新一代流行的瓜瓜毛毛倒灑脫多了。

娛樂圈中很多新進以僻字用名的女藝員，有些字連字典也查不出來，大概以為名字愈僻愈易引人注意，殊不知名字愈淺白愈易宣傳之效，試看看同是詩人，李太白/白居易詩好之餘不是更容易引人傳頌嗎，蔡母濟/權德輿就算也有「二白」一樣詩才，至今還有幾多人認識？



◆重厚好還是清秀好？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參與感與鼓勵性

欣聞國家第四批預備太空人的選拔工作，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消息令人興奮。雖然全國名額只有兩位，且有學歷和年齡要求，入選機會不多，卻具象徵意義。那不僅僅是學術資格的認可，重要的是傳遞出港人有機會參與國家級科研大事的信息。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航天科技近年屢傳捷報，看一艘艘「神舟飛船」順利返回地面，港人也與有榮焉；國家太空人訪港，更廣受市民歡迎，但那主要還是「觀者」身份。如今，港人有機會參與其中，代表中央對港人的關心和信任，無疑為人心回歸打了支強心針。

在太空領域，港人以往較多接觸的是美俄主導的「國際太空站」及其相關信息，主要受由此啟發而創作的電影和時裝設計等流行文化影響，尤其是科技巨頭大炒「太空旅遊」概念。記得幾年前跟科技記者談選題時，發現他經常撰寫國際太空站相關文章，我建議他把眼光擴大，留意中國近年

機構合作運轉，我國曾表達參與其中的意向，卻遭美國反對。不過，此舉反而促使我們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天宮太空站」。不過，對一般港人來說，中國人和太空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這令我想到今年開始落地港澳的「國家藝術基金」，本港共有9個項目入選。我曾接觸過幾位獲獎者或獲獎項目負責人，比如「書法《矛與盾》」獲獎者容浩然、「小戲曲《畫皮》」獲獎項目之靈霄劇團創辦人高鴻濤等，他們都說多年努力獲國家級認可，深受鼓舞，更有參與感。尤其是個人化或小劇團式創作，一直都是矢志堅持和艱難維持。

科技創新和文藝創作往往不是短期見效的，參與其中的人若不是特別專注和熱愛，是很難堅持下去的；而且在研究或創作過程中，還要不斷地調整和更新，冒着前功盡棄的失敗風險。

過去，由於「兩制」因素，加上「有心人」教唆，部分香港年輕人對祖國疏遠，慢慢生離心，以致發生諸如3年多前的「黑暴」，更有懵懂中學生提出「為什麼要跟中國融合而不是其他國家」之類的疑問。這其實跟參與感有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往往是在參與其中而增加了解，產生親切感，對國家的認同亦然。



方寸不亂

方芳

法官的天與地

香港人對國家的司法認識不深，因為香港實施的「普通法」與內地的「成文法」有不同，只是透過內地一些大案的宣判，略有所知；最近看了內地熱播劇《底線》，對當代中國司法，有進一步的認識。

這部由劉國彤執導，靳東、成毅等主演的電視劇，真實案件演繹，反映司法人員堅守人性、道德、司法底線，又有相當篇幅普及法律知識，讓人民在生活中了解法律常識，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權益。

如《追債尋母案》、《被男友閹殺害案》、《高校生弒母案》等，透過人倫的考量，讓法律變得更有溫度。

該劇被認為真實、感性，主要是劇情貼地，不是高官貪污案，而是老百姓在新時代面對的新糾紛，好像《主播猝死案》，網紅在勞累中猝死，如何向網購平台索償；《奶茶加盟案》反映了不少連鎖加盟店合同存在的問題，對創業者不無啟發。

此劇之所以令觀眾追捧，拍攝手法是相當成功的，一定的篇幅描寫法官一槌定案的背面，也有生活的喜怒哀樂，法官在判案後被取訴一方騷擾；法官在案件調解後又有逆轉發展，法官找不到說理的地方，會委屈得暗自抽泣；法官也有自己解決不了的家庭問題，如單親子女照顧母親，家長面對子女學校霸凌問題，更有經濟誘惑……，中國內地司法人員的天與地，並非一片冰冷的凍土，也有老百姓的火與熱。

該劇以一個地區的法院為基地，堆積如山的案件糾紛，法官能調解就調解，我們也從中看到調解手法的高低。一宗房產案，華僑富商的姨太太，住在已故富商的老房子，等到百齡不見人歸來，卻是等到富商的兒女收回房子，法官在法外情，爭取讓老人家過百齡生日後才搬遷，是很溫暖人性的一幕。

據說該劇拍攝前期，採訪過百餘名法院工作人員，全部改編自真實案件，演員體驗法官生活，所以演員演來真實自然，值得香港觀眾一看，從中了解當代中國的國情。



百家廊

孫貴頌

從西安走時，氣溫攝氏38度。這是1985年的夏天。我和妻利用假期外出旅遊。

我們沿寶成鐵路南下。茫茫夜色中，只感覺火車不時地穿過一個隧道，又穿過一個隧道；視線一會兒兒青、一會兒幽暗、一會兒又轉成鉛灰。這條鐵路，是中國鐵路史上的奇跡。沿途幾乎全是崇山峻嶺，地勢極為複雜，工程艱巨異常。共和國的鐵道兵和鐵路工人，硬是逢山開道，遇壑架橋，在長達1,083公里的鐵路線上，打通隧道427個，架設橋樑653座，在隧道裏或橋樑上建造了幾十個「地下車站」或「空中車站」，整個工程歷經12個春秋，1970年7月1日正式通車。於今我們身臨其境，卻因為是晚上，體會不到多大驚險，留下些許遺憾。

凌晨到達昭化車站，馬不停蹄地趕到汽車站，坐上了去往九寨溝的汽車。一路上的勞頓非言語所能道盡。那時交通落後，我們坐的竟是一輛解放牌卡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搖蕩，一邊是懸崖峭壁，另一邊是水流湍急的白龍江，人似在畫中游，心卻提到了嗓子眼。一天下來，嘗盡「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滋味。好在九寨溝的風景迷人，算是將一路上的艱辛做了補償。

從九寨溝出來，有人指點，可以坐九寨溝至成都的旅遊車，途經松潘草地，「走」長征路。這一消息，使我倆陡添驚喜。一咬牙，每人花80元買了一張車票——這在當時可是昂貴的，過草地。

時值8月。出發時還是豔陽高照，酷暑當頭。我們這一車來自天南海北的遊客，清一色夏裝裹身。我穿短褲背心，妻着短衫長裙。進入草地後，人煙逐漸稀少，頓有荒涼之感。偶爾可見一些石頭堆，討教同行客方知，那叫「瑪尼堆」，藏語稱「朵幫」，就是疊起來的石頭之意，類似於蒙古族的「敖包」。說明我們已進入藏族居住地區。藏民以碎石塊壘成堆，布上經幡，每次路



琴台客聚

伍宗泉

重陽過後，秋意漸濃。秋意濃了，睡意也漸濃，即便在大多時候都很自律地早睡，第二天仍舊要在睡夢中掙扎又掙扎，才能醒過來。有時候彷彿又回到了小的時候，在一覺醒來之後怔怔地呆上半年，問自己幾遍「我是誰？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

我小的時候，父親的單位到處搬遷，駐地經常變去，我讀書的學校也經常變去，有時候轉了學，連一個學期都沒讀滿，父親的單位就又要搬了，我們便又要跟着搬家，又要去面對許多陌生人。如此年復一年，年歲逐漸地增長了，心底的安全感卻沒有隨之增長。

所幸，單位雖然經常搬遷，單位食堂的廚師卻是常年不變，這讓自小「為食」的我在吃着熟悉的人做的熟悉的食物時多少會感到安心。

食堂的大廚裏有一位是北方人，做的麵食極受歡迎，尤其是筋道的老麵饅頭和包子，早上若是起得晚了，想吃他做的饅頭和包子，便只能等到第二天。我當時就讀的鐵路子弟校的班主任老師在一次家訪時留在我家吃飯，嘗過那



書聲蘭語

廖書蘭

《黃花崗外》增訂版出書感言

去年(2021年)是辛亥革命成功110周年，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拙著《黃花崗外》簡體字增訂版，拙書能在內地出版及發行是我多年以來的心願。作為一個居港台灣同胞，自1999年開始在大公報、香港文匯報皆開有專欄；偶寫日月星辰、花鳥蟲魚，偶寫本港社會百態、兩岸情況、國際局勢，20多年來筆耕不斷，樂此不疲寫一個文學人眼中的家國情懷和一顆中國心。

今年10月是辛亥革命成功111周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今年的重陽節(西曆2022年10月4日)是孫中山先生唯一親自策劃、親自領導的史稱第一次「廣州起義」的第127個年頭，這也是《黃花崗外》的主題內容。

每到金秋10月，不期然都會想起中華民族的近現代史。回顧孫先生親自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九月初九(西曆1895年10月27日)在廣州發動起義，由於未發一槍即告失敗，歷來無人研究其原因；幸運的，我在胡志偉先生推薦下獲得一份《黨人碑》打字稿，並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查閱發表於1907年《時事畫報》(廣州出版)，作者黃世仲以第一次廣州起義為內容的報道文學體小說《黨人碑》，閱讀其中開始滿足我對該次起義竟未發一槍就失敗的好奇；由於當年沒有出版單行本，又《時事畫報》連載的《黨人碑》有三分之一散佚，若欲了解全貌就必須外求，後經中國

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陳鵬仁主任委員的協助，得以翻閱了大量文獻資料，方能全面地了解興中會時期廣州起義的史實，包括背景、成因、失敗、逃亡及失敗後對孫先生本人和清末朝廷與民心的影響。

作者黃世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化人，短暫的41歲生命裏，創作大量的文學作品(共20本)，創辦或參與多份報紙，1903年有「黃世仲的一枝筆，勝過三千支毛瑟槍」之譽；也有「北章南黃」之說，章指章太炎，黃指黃世仲，由此可見，黃世仲在當時有一定的文化影響力。令人扼腕的是，黃世仲(1872年-1912年)並非死於辛亥革命的炮火中，竟是死於辛亥革命成功後，被同志間的猜忌而誣陷陷害。

中華民族自清朝末年的近百年中，受盡外國欺壓，屈辱賠款，內憂外患，民不聊生。今天中華民族的復興，需靠每一名中國人的奮鬥自強，團結一心。而今香港跨過了因香港國安法的設立，被某些人過分解讀，所帶來的誤解而移離香港，及因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全球經濟蕭條。

香港是祖國的窗口，在任何的難關下，都有祖國適時在背後支撐。我們看見李家超行政長官上任以來大聲呼籲，香港要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要搶人才！是的，不能讓新加坡掏走了我們的人才與錢財，香港已有成熟穩健的金融體制，恢復2019年前的經濟指日可待，「香港好，祖國好」只要有一個中華盛世，才不負辛亥革命的愛國英烈魂。

◆北京團結出版社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出版者《黃花崗外》！作者供圖



草地8月雪

過時，就在石堆上添加一些石塊，然後繞「瑪尼堆」順時針走3圈，祈求上天保佑。這裏人煙稀少，天高地闊，間或出現幾頂帳篷，二三牧民，還有陪伴他們的牛馬。牧民見到汽車，老遠就招手，就喊叫，我們還之以禮，也揮手、也喊叫。雖然素不相識，心卻在溝通交流。天空忽有蒼鷹盤旋，妻首先喊：「高山之鷹！」車廂裏的人都伸出頭來，對着天空大叫：「高山之鷹！高山之鷹！」車廂裏，一派浪漫、歡樂景象。

不料，再往前走，氣氛逐漸冷卻下來。雖然門窗緊閉，但我們卻分明感覺到寒冷在逼近、壓迫過來。一步一步，一點一點，令人漸漸招架不住。冷，徹骨的冷。又過了一段時間，天空中居然飄起了雪花。雪花紛紛揚揚，似乎很溫柔，很耐心，輕輕地叩擊着門窗，無聲無息地陪伴着我們前行。同車中有幾個廣東青年，生平第一次見到真雪，不由激動得大呼小叫。當司機在一個地方停車讓大家「方便」時，他們又是拍照，又是打雪仗，可樂壞了。路旁有青青的小草，小草中間有成群的犛牛，以黑色居多，毛長長的，在悠閒地吃草。犛牛不怕冷。

我們怕冷。在車廂裏面坐着，又不能活動，大家一個個瑟縮着，紛紛從隨身的行囊中搜尋衣服禦寒——實在也搜不到什麼衣服，除了夏裝，還是夏裝。我將一件雨衣披在身上，妻子索性把一條裙子套在頭上。這時最艱巨的任務，是把禦寒。

在草地上共走了兩天。第一天傍晚到達松潘縣城。松潘西面，有個地方叫毛兒蓋。1935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等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這裏。部隊一面籌糧準備過草地，一面耐心等待張國燾率領的四方軍到來。其時，張國燾自恃兵眾槍多，已經不把中央放在眼裏。他野心大發，企圖篡奪領導權。8月6日，黨中央在毛兒蓋的沙窩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對張國燾進行批評教育，決定紅軍兵分左右，經草地北上。然而張國燾竟拒不執行中央決議，主張西出阿壩，向青甘邊緣

退卻。8月20日，中央又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反對張國燾的錯誤，堅持北上，實現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戰略目標。這兩次會議後，右路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的指揮下，戰勝嚴寒和飢餓，勝利通過草地，到達四川巴西。而左路軍由於張國燾的倒行逆施，使紅軍兩過草地，遭受了巨大損失和痛苦。

第二天，我們開始穿越草原腹地。或許由於氣候逐漸乾燥的緣故，草原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遍地是泥濘沼澤。但天氣依然不好。天空仍不時飄着雪花。遠處雪峰連綿，眼前野草茫茫。牛糞觸目皆是。顯然，這裏已經成了良好的牧場。而50年前不是這樣。當年紅軍過草地時，也是8月，氣候比現在惡劣得多。記得曾讀過周恩來的警衛員魏國祿的回憶錄：「草地是個氣候變化無常的地區，有時天空無雲，烈日曬得臉上火辣辣地疼；有時烏雲密布，疾風暴雨猛烈襲來，一剎時就倒到了嚴寒的冬天。在那愈走愈難走的草地上，長滿了齊腰的水草，起伏不平，踏上去像是走在海綿上的一樣晃蕩。」當時，紅軍後有川軍，前有胡宗南，還要攜帶武器和極少的乾糧，又缺少禦寒的衣服，在茫茫的草地上跋涉了十幾天。糧食吃完了，就挖野菜，吃草根，喝涼水，咽棉花，有許多同志沒有走出草地就累死、餓死了。先烈們沒有想到，在他們倒下14年之後，新中國就誕生了。半個世紀以後，又有一些人坐着旅遊車，來重踏他們的足跡。雖然我們的目的是為了玩耍，但也出於緬懷和感恩。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對紅軍懷着深深的崇敬和謝意。

是的，歷史不應該忘記。就在第二天，我們到達了紅原縣。紅原縣屬於阿壩藏族自治州，原先叫哈拉瑪，因為紅軍當年長征經過這裏，解放後更名紅原，意為「紅軍走過的草原」。人民沒有忘記。

出紅原抵南，經刷經寺，直奔成都，離松潘草地漸漸遠了。又是豔陽高照。

遠去的菠蘿包

位北方廚師幫的饅頭之後讀不飽口，每到周末放假就會託幫他買幾個饅頭或者包子，周一返校時帶去給他。

父親單位廚師做的饅頭、包子雖然好吃，在當時的我的一些同學眼裏看來卻是很「土」的食物。那段時間我所讀的鐵路子弟校，在那個年代因為單位福利好，學生的伙食費交得也高，因此食堂的伙食亦是比別的學校甚至機關單位要好，要「洋氣」。對於我來說，「好」和「洋氣」的標誌是每到周六，食堂的早餐裏都有豆漿、牛奶和蛋糕、麵包，那時候的麵包種類不多，學校早餐配的幾乎都是奶油菠蘿包。

最初吃奶油菠蘿包，陶醉於它的柔軟和香甜，總是一拿到手就迅速地吞吃下肚，又期待着下一個周六的早餐。吃了幾次之後終於想起父親並沒有吃過這樣「洋氣」的麵包，便耐住腹中饑餓的垂涎，周六早餐時把菠蘿包留下，到下午放學時帶回家給父親嘗鮮。

從學校到家裏要坐好幾個站的火車，不到10歲的孩子，書包裏背着寶貝一樣的菠蘿包，聞着香氣忍了又忍，終是忍不住，將麵包拿出來，把

上面的酥皮擱下一小塊吃掉，又再擱一小塊……於是，父親最後吃到嘴裏的菠蘿包是沒有「菠蘿」的。那天是重陽節，那時候父親還年輕，菠蘿包沒有菠蘿，父親的嘴角卻有笑容，就像我在某年春節花光了我的壓歲錢，只剩下三毛錢給他買了兩包「大鐘」煙，他抽着煙時的笑容一樣。

今年重陽，朋友和我聊起他的故鄉，聊起他的思鄉之情。朋友的故鄉在北方，是他出生、成長的地方，他酷愛吃麵食，遠離故鄉數年未回，彷彿在咀嚼麵食的時候，就能從裏面感受到故鄉的味道，那味道亦能從胃裏抵達心裏，泛着一絲愁，又彌補着遊子不得歸的幾分遺憾。

有的遊子離家是自己的選擇，有的遊子是迫不得已，至今尚未結束的俄烏衝突讓許多人迫不得已地成為背井離鄉的遊子。而對於戰爭，我們大都是無能為力的。惟願他們不要再繼續如我幼時一般每天醒來都要迷茫地想去自己在哪裏，要到哪裏去，能早些再吃到沒有愁思的故鄉的味道。

畢竟，能踏踏實實地站在故鄉的土地上，舌尖上有故鄉的味道，才是最令人心安的。